

展时代画卷
谱奋斗华章

近日,电影《我的父亲焦裕禄》在全国点映,我和李唯担任这部影片的编剧。焦裕禄对我来说,又亲切又熟悉又陌生。亲切,是打从我记事起,就经常听到大人们谈到焦裕禄;熟悉,是因为从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、1991年版电影《焦裕禄》,到后来的电视剧、戏剧等,这些文艺作品让我逐渐了解焦裕禄的生平事迹,他似乎是一个我已经认识很久的人;陌生,是因为自己又只是一个旁观者,并没有真正走进他的世界。

用半个多世纪认识一位好人

我对焦裕禄最初的记忆和一次广播、一份报纸联系在一起。那是在1966年,我11岁。家里有一个老式收音机,接触不太好,听广播时常断断续续。有一天,我的父亲、母亲和哥哥围坐在收音机旁,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,他们一边听一边哭。而后,母亲拿回家一份《人民日报》,报纸上全文刊载了这篇通讯。我记得这一期报纸在家里保存了很久。那时,我刚上小学二年级,还不太懂发生了什么。只记得母亲每次谈到焦裕禄时都说:“好干部、好人名!”

1975年7月,我来到大连新金县瓦窝公社陈店大队,开始了知青生活。到了冬天,地冻得结实,一帮年轻人窝在一起过冬。其中一个人的父亲在图书馆工作,他有一个小木头箱子,里面装了不少书,从革命历史题材的《红旗飘飘》《星火燎原》到法国作家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等,都有。还有一本书是由几篇写英模人物的文章集结而成,其中就有以焦裕禄为主人公的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。

已经是农民的我,对农村、农民开始有了一些感受和认识,下工后写小说,也有了一点艺术感觉。这时“遇到”这篇通讯,带给我很强烈的震动。焦裕禄的事迹本身很感人,长篇通讯也有独到的发现、独特的表达。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的文学性很强,细节充实,人物对话精彩。通讯里有几个细节让我最为感动。一个是在梁孙庄,焦裕禄看望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。“老大爷问他是谁?他说:‘我是您的儿子。’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?他说:‘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。’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,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。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:‘解放前,大雪封门,地主来逼租,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,住人家的牛屋。’焦裕禄安慰老人说:‘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,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。’”另一个细节是描写焦裕禄坐的藤椅。焦裕禄肝病越来越严重,为了止痛,他把一根硬东西的一头顶在藤椅的椅靠上,一头顶着肝部。时间久了,藤椅被顶出了一个窟窿。通讯的最后描写老百姓给焦裕禄送行,也是朴实动人,让人落泪。这时的我,充分理解了小时候母亲常说的:“这是一个好人。”

重写焦裕禄:新的发现新的视角

如今,距离我“初识”焦裕禄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,没想到我会直接面对他,要创作一部表现焦裕禄精神的电影剧本。我得做功课,得有新的发现。

焦裕禄女儿焦守云给了我厚厚一沓材料和一本书。这些内容大多来自她的母亲徐俊雅,真实可靠。我又和剧组去博山焦裕禄纪念馆,去焦裕禄当年在洛阳和兰考工作生活过的



创作更多优秀文艺作品——

展现先进人物的人格光彩和精神力量

高满堂

地方进行实地采访。渐渐地,随着挖掘到的素材越来越多,一个更为丰富的焦裕禄形象清晰起来,焦裕禄精神发展的历程也在我眼前展开。我知道,剧本可以动笔了。

“心中装着全体人民、唯独没有他自己”的公仆情怀,凡事探求就里,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”的求实作风,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“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”的奋斗精神,艰苦朴素、廉洁奉公、“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”的道德情操,焦裕禄精神有其生发、绵延的过程,不仅仅体现在他带着兰考百姓大干苦干的475天中。

焦裕禄是山东人,齐鲁文化孕育了他。他在山东博山和敌人做斗争,机智勇敢,那时的他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。他的母亲对他影响也很大。就像影片中他娘对他说的:“天上一颗星,地上一个人。你要是个好人,天上那颗星就是亮的。”

那之后,焦裕禄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车间主任。洛矿时期进一步磨炼了焦裕禄的精神品格。我们在车间采访时,有工人说:“焦裕禄是大工匠。”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焦裕禄的这一面。他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,在大连起重机械厂当实习车间主任。面对设备落后、经验不足等困难,焦裕禄带着洛矿工人成功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2.5米双筒提升机。研制期间,他天天在车间睡长条板凳。老工人对我们说:“焦裕禄为什么不在床上睡?他怕睡的时间长,耽误了进度。”这条长板凳有多窄?只能侧躺。一翻身,人就滚到地上醒过来,醒过来就

手机摄影——

数字时代的
文化生活

十几年前,智能手机刚刚问世,拍摄还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属功能。而今天,拍摄功能已经是判断手机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。

这十几年,也是手机摄影从兴起到流行再到普及的过程。现在,很多人在用手机摄影。伴随社交网络及自媒体的发展,手机摄影已经成为数字时代人们重要的文化生活组成,是一件伴随技术发展出现的新兴大众文艺形式。

如果认为手机摄影无非就是随手一拍,加个滤镜美化一下;或者认为没有足够专业的相机、没有庞大的镜头群,就拍不出好作品,那不妨去看一下近年来手机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吧,相信这些照片足以打消你的疑虑。

手机本身体积小、轻便、易操作,取景自然,纪实性强,便于随手取用生活中的拍摄素材。手机摄影的这种便捷性,让人的眼睛、大脑和快门几乎处于同步状态。一些场景甫一映入眼帘就能被瞬间记录下来,人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

美的享受与创作。

手机摄影建立了一套完整有趣的摄影生态系统。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学习,就可以上手拍摄;拍摄后,马上就能在手机上进行后期处理;处理完成后,社交网络就是你全天候的个人画廊,可以自行选图、自行配文,做自己的策展人;微博或者朋友圈的点赞、转发、留言,则是对摄影作品最生动最多样的评价。

小屏浏览、即兴创作、即时后期、独立传播,这些正是手机摄影的魅力。越来越多的专业摄影师正在用手机拍照,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通过手机接触到摄影。虽然在夜景拍摄、体育赛事拍摄、野生动物拍摄等特殊场景下,手机的完成度不如相机,在输出打印时,手机摄影的画质也有一定欠缺,但这些都妨碍手机摄影的“艺术性”逐渐得到认可。今天,手机摄影已经从最初的自娱自乐,渐渐向艺术创作靠拢;从单纯图像层面的“好看”,向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延伸。

起身接着干活儿。

这条长板凳到现在还留着。我看着板凳,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。当年焦裕禄就是这样憋着一口气,带着大伙造出了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造出来的机器。

从在博山对敌斗争,在洛矿研制大型机械设备,到赴兰考“去三害”,焦裕禄敢挑重担、勇于临危受命的担当一脉相承。认识到这一点,我心里有了数:有理由重写焦裕禄,要把焦裕禄精神形成的历程更加完整地反映出来。

小说家李准说过一句话:“你给我100个情节,不如给我两个细节。”创作中我也秉持这个方法。有时采访对象一句话带过的内容,你如果沉下身子去生活里、史料里淘洗,就会拂去尘埃,发现真金。在这次剧本创作中,焦裕禄有3句话很感动我。一处是地委书记找焦裕禄谈话,调他去兰考。地委书记说:“兰考36万人,有20多万在外逃荒。”焦裕禄说:“我去。”什么是好干部?这就是。在天大的困难面前不打退堂鼓。另一处是,焦裕禄说:“什么县委书记,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卒子,什么事都得往前拱,拱到第一个!”还有一处是影片最后,焦裕禄临终前嘱咐子女:“你们长大了要做一个好人,眼睛里要看得见受苦人的眼泪。”我想,能够打动我的,也会打动观众。

在剧本中,我还想把焦裕禄丰富的精神世界表现出来。焦裕禄热爱文艺,演过歌剧男一号,他还会拉二胡、吹唢呐、跳舞。这些生动的色彩,我也写进了剧本。

韩 松

在众多国际摄影展览上,手机摄影作品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。

手机摄影不仅激发了人们的摄影潜能,也让人们充分感受到摄影社交和大众艺术带来的乐趣。手机摄影可以说是一种以图像为媒介的生活方式。人们通过摄影来表达对生活、对事件、对世界的看法;通过摄影交流感情、增进彼此了解;通过摄影记录自己的生活,获得精神上的满足。

如果你喜欢拍照,那一定有特别想记录下来时刻。这就是摄影的兴奋点。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艺?手机摄影爱好者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突破。一是多去拍自己熟悉的、易于拍摄到的、善于敏锐捕捉到的题材。这些题材易于代入拍摄者的情感,能反映拍摄者的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,也能激发拍摄者的创作冲动。手机摄影要出好作品,不能一味模仿,而应回归自身的生活。二是要学会拍照,学会用

还有许多“焦裕禄”,等待我们去书写

我常常问自己,为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,焦裕禄这个人物形象仍然如此深入人心?

我在博山焦裕禄纪念馆采访,看到很多年轻人认真地看、认真地倾听,眼里泛着泪花。在洛矿车间、在兰考,剧组所到之处,人们提起焦裕禄也常常热泪盈眶。他们其实已经不是那段往事的亲历者,为什么依然如此动容?在今天的兰考,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泡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。人们亲切地把这棵泡桐称作“焦桐”。几乎每一个从它身边经过的人,都会深情地望一眼。在人们心中,这棵树代表的就是焦裕禄。焦裕禄精神的穿透力为什么如此强大,为什么一直在时光中闪闪发亮?

我认为,这是因为焦裕禄代表的是党的宗旨: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“百姓谁不爱高官?百姓对党的认识,首先来自身边的共产党员。像焦裕禄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,让人们对党的性质、党的宗旨有了具象化的认识。他用自己的这一生,告诉人们,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什么,人民期待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,中国共产党怎样团结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。这就是一个英模人物的说服力!

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做的,就是把这些人原本的人格光彩和精神力量写出来、拍出来、演出来。怎么做到这一点?首先,艺术创作者本身要有这样的文化自觉,要对自己所表现的人物和人物精神充满热情和信念,这是一部好作品的根基。否则,创作不出好作品,也愧对生活中的这些人物。其次,要符合艺术规律。文艺作品既要有“意义”,又要有“意思”,就是要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。

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支撑点。像焦裕禄这样,共和国不能忘记、历史不能忘记的英模人物有很多,我们是否了解他们?我们的孩子、孩子的孩子是否知道他们?历史不能走样,价值不能混乱,这是文艺工作者进行文艺创作的底线。

建设我们的国家,离不开党团结带领人民,离不开优秀共产党员的榜样力量。当前,我们那么多党员干部正在践行焦裕禄精神,有那么多优秀共产党员正在发扬杨善洲、黄大年、黄文秀等英模人物的崇高精神,文艺创作不能忘记他们。今年是主旋律文艺创作的“丰收年”,我对正能量文艺作品的创作充满信心。

(作者为编剧,本报记者徐馨、任飞帆采访整理)

图片为电影《我的父亲焦裕禄》剧照。 制图:沈亦伶

《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》是一部深入生活、为人民抒怀、为时代立言的优秀报告文学。十八洞村位于湖南湘西,是一个青山环抱、绿水环绕的苗族村寨。2013年11月3日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,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方略。沉睡在贫困中的十八洞村自此蝶变,张开彩色的翅膀,奋力飞翔在脱贫攻坚的春风里。2019年初冬,作家李迪来到这里,每日早出晚归、翻山越岭、走村串寨,在村民家中烤火塘、喝热茶、聊家常、听故事……这部书讲述的就是李迪在十八洞村听来的脱贫故事,语言质朴无华,情感真挚深长。

这是一部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。作家把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作为创作的前提。他在十八洞村的日子,或帮着村民卖菜吆喝,或陪着老乡种地聊天,或钻进饭店后厨给老板打下手,逮着谁就饶有兴趣地听对方说说村里脱贫攻坚的故事。很快,李迪的到来成了十八洞村人尽皆知的新鲜事,老乡们都称:“这个从北京来的李老师,没什么派头!”他们把“李老师”当成了拉家常、话脱贫的老朋友。

书中《头上剃字的人》讲述了热爱十八洞村甚至在后脑上剃了“十八洞”三个字的村民杨超文脱贫致富的经历。开头一段就是杨超文的话:“李老师,我没有故事。但是,我特别想跟你说说话,讲讲我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……你愿意听我讲,还说我讲什么你都愿意听,这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”话匣子打开了,故事也就诞生了。李迪在村民的叙述中,对他们的经历有了深切的体察,与他们产生真挚的情感共鸣。这些平常百姓的故事让我们读到了有血有肉的人物,读到了有酸甜苦辣也有梦想的人生。我们为他们的克服种种困难、过上小康生活感到无比欣喜和由衷钦佩。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,目的在于写好人民,李迪正是这样一位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作家。

李迪将村民讲的故事进行恰如其分的剪辑整理,用18个故事展现十八洞村发生的深刻变化,从小切口入手,真实反映脱贫攻坚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,为历史存照。《金兰蜜》里的龙先兰,父亲去世,母亲改嫁,妹妹离家出走,他感到生活无望,自暴自弃。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把他带回家当弟弟一样看待,先出钱让他摆鱼摊,生意不好,又出钱让他去学养蜂,还帮他盖房子、娶媳妇,建成“金兰蜜”蜂场。《就是悬崖我也要跳》中的隆英足舍弃高薪,回乡养殖创业。一个女孩子独自睡在山上养殖场,克服重重困难,终于把企业做大做强。《黄桃金灿灿》的讲述者是村主任隆吉龙。他曾在深圳打工,整整十年没有回过家。在深圳打拼小有成就以后,他决定返乡创业。创业之路非常艰辛,但他抱定“要干出一番事业”的决心。几年过去,他在全村推广种植的黄桃终于大获丰收,成了全体村民的脱贫桃、致富桃……脱贫攻坚战中,十八洞村是一个样板,也是一个缩影,它的故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注脚。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经验,不仅是一曲改变命运、迈向全面小康的壮丽凯歌,更是世界反贫困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生动中国故事。

李迪已经离开了我们,离开了他深爱的这片土地。《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》是他在2020年6月创作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。可以说,他把生命最后时光全部贡献给了脱贫攻坚题材创作,贡献给了对伟大时代、伟大人民的热情讴歌。中国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给予李迪高度评价:“他的作品是质朴的,没有华丽的修饰,他努力写出人民心里的话,他的风格温暖明亮,他的态度情深意长,这在根本上源于他对人民群众深切的情感认同。”“从这些作品中,我们感受到的是广袤的大地与奋进的人民,感受到在一个一个人物身上,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战士、劳动者身上那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力。”

温暖明亮 情深意长

——评李迪《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》

路英勇



李迪著,作家出版社出版。《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》:

文艺评论